

北魏末帝位异动与东西魏的政治走向

何 德 章

公元532年4月,已据有河北的高欢在清除尔朱氏残余势力后,率兵进入洛阳。高欢废黜尔朱氏拥立的皇帝元恭,即北魏历史上的前废帝,同时又废黜其在河北赖以与尔朱氏抗衡而拥立的皇帝元朗,即北魏历史上的后废帝,改立元脩为皇帝,此即北魏历史上的孝武帝,《魏书》又称之为“出帝”。《魏书》卷11《前废帝纪》称元恭被废黜后赋诗一首云:“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惟有修真观。”“一年三易换”形象地概括出当时政局的波谲云诡。通过“一年三易换”,高欢暂时解决了两个中央政府并立的局面,重新确立起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

对于北魏末年政治动荡过程中帝位异动现象,迄无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之下,皇帝尽管没有任何个人权威,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象征。选择何人来作这一个象征,往往不是某个操纵政局的人随心所欲的事,帝位异动反映的是当时政治文化的走向,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和妥协。我们拟通过对北魏帝位“一年三易换”政治内涵的探讨,分析北魏末以及东、西魏对峙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主流,从而揭示这一时期历史运动的趋势。

一、帝位异动的政治内涵

高欢在河北汉族豪族的鼓动下,起兵反叛尔朱氏,拥立北魏宗室元朗为皇帝以相号召,当其率兵进入洛阳前,尔朱氏控制的洛阳元恭政权发生分裂,大都督斛斯椿、贾显智及西北大行台长孙稚等擒杀尔朱天光、尔朱度律、尔朱世隆及尔朱彦伯等人,在名义上归附高欢。但洛阳政权仍拥有很大的势力,孝文帝迁洛后一直作为军事基础的“六坊之众”仍分布于洛阳周围,受元恭号令,各州郡还有许多拥戴洛阳政权的力量没有附于高欢及其拥立的元朗,而且关中以贺拔岳、宇文泰为首的势力已隐隐形成,亦以洛阳为归属。这一形势使高欢进入洛阳后难以用自己拥立的元朗直接取代元恭。

因此,高欢在携元朗挥军渡过黄河后,没有立即进入处于政治漩涡中的洛阳,而是驻兵河阳,遣魏兰根“慰喻洛邑,且观帝(案:指元恭)之为人”,似有抛弃自己所立的元朗,拥立尔朱氏所立的元恭的意图。据说魏兰根见元恭“神采高明”,“恐于后难测,遂与高乾兄弟及黄门崔陵同心固请于高祖(案:指高欢),言(前)废帝本是胡贼所推,今若仍立,于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①。《魏书》卷81《蔡俊传》记其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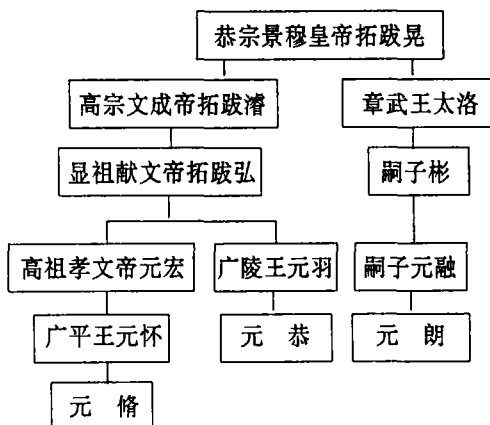
及尔朱世隆等诛，齐献武王赴洛，止于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尔朱暴虐，矫弄天常，孤起义信都，罪人斯翦。今将翼戴亲贤，以昌魏历，谁主社稷，允惬天人？”中令频频，莫有应者。（綦）俊乃避席曰：“人主之体，必须度量深远，明哲仁恕。广陵王（案：指元恭）遇世艰难，不言淹载，以人谋察之，虽为尔朱扶戴，当今之圣主也。”献武王欣然是之。时黄门侍郎崔陵作色而前，谓俊曰：“广陵王为主，不能绍宣魏纲，布德天下，为君如此，何圣之有！若言其圣，应待大王。”时高乾邕、魏兰根等固执慢言，遂立出帝。

如果高欢集团内部的人不反对，径以元恭为皇帝，能够获得各方政治势力的认可，于高欢未必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由于魏兰根、高乾邕及崔陵等的反对，高欢“不得已”而并弃元朗、元恭，改立元脩为皇帝。

问题是元脩何以得立，元脩被立为帝时年已 22 岁，并非柔弱易与之辈，后与斛斯椿等图高欢，逐其布置在洛阳控制朝政的封隆之等人，于河南聚集军队，招纳关中字文泰集团，与坐镇晋阳遥控朝政的高欢对垒。高欢部属匡狄干因而责备高欢说：“本欲取懦弱者为主，王（案：时高欢封渤海王）无事而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司马子如亦说：“本欲立小者，正为此耳。”^②则当“一年三易换”之事发生时，高欢集团内部确曾有人主张“立小者”、“取懦弱者”为皇帝，以便驾驭，这也是权臣控制朝政惯用的伎俩，但高欢竟不加采用，而立年长且“性沉厚少言，好武事”^③的元脩为帝。看来元脩得立，除了高欢为避免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纠纷及控御朝政的考虑外，还别有原因。《魏书》卷 11《出帝纪》称：

中兴二年四月，安定王（元朗）自以疏远，未允四海之心，请逊大位。齐献武王与百僚会议，金谓高祖不可无后，乃共奉王。

据此，元朗逊位于元脩，还因为他“疏远，未允四海之望”，元脩则无此弱点。这里所说的“疏远”，在“金谓高祖不可无后”一句中可得到解释，“高祖”即北魏孝文帝，“疏远”谓非孝文帝直属后裔。兹将元朗、元恭、元脩三人有关的世系列示于下，以便分析：



三人中,元朗虽属皇族,但与孝文帝的血缘关系已远,元恭为孝文帝侄儿,较作为孝文帝之孙的元脩来说,与孝文帝的关系又远一些。在“高祖不可无后”的前提下选择皇帝,元脩无疑是最佳人选。

有趣的是,元恭本人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孝庄帝元子攸扑杀尔朱荣以后,尔朱荣弟侄尔朱世隆等反攻洛阳,最初拥立的皇帝是元晔,乃北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濬之弟南安王拓跋桢之孙。“及庄帝崩,尔朱世隆等以元晔疏远,又非人望所推”^④,遂改立元恭为帝。元恭得立为帝,亦因他相对于元晔来说,与孝文帝的关系不那么“疏远”,更能满足“四海之望”。孝文帝的影晌是北魏末各种政治势力在选立皇帝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于此可见一斑。

元脩得立为帝,首先是出于确立孝文帝法统的考虑。支持立元脩为帝的崔陵在为之所作即位诏书中称“朕托体孝文”,魏收“嗤其率直”^⑤。今检《魏书·出帝纪》,有“朕以托体宸极,猥当乐推,祗握宝宪,承兹大业”之语,当因魏收讥讽“托体孝文”太过直露,才改作“托体宸极”这一较为典雅的文句。但我们的确还可以找到这种“率直”的句子。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甲寅,皇太后胡氏在皇帝元诩暴死而无子嗣的情况下,为稳定局势,立三岁小儿元钊为皇帝,诏书中说:“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经世……国道中微,大行绝祀。皇曾孙故临洮王宝暉世子钊,体自高祖……允应大宝,即日践祚。”^⑥由于《魏书·孝文五王传》脱略不全,我们已难考知元钊究竟是孝文帝哪一个儿子的后代,但他是孝文帝的曾孙应无疑问。“体自高祖”与“托体孝文”一样直露,反映出胡氏急于“允四海之望”的心情。崔陵为元脩撰即位诏,不加思索地写上“托体孝文”这样“率直”的文句,与胡氏所为具有同样的目的。

尔朱荣进兵洛阳,杀胡氏所立“体自高祖”的元钊,改立孝文帝弟彭城王元勰之子元子攸为皇帝,即北魏孝庄帝。《魏书》卷10《孝庄帝纪》称尔朱荣举兵向洛,“谋欲废立。以帝家有忠勋,且兼民望,阴与帝通”。似尔朱荣一开始便决定立他为帝,这并不确切。同书卷74《尔朱荣传》说:“荣抗表之始,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庄帝,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等还北,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师次河内,重遣王相密来奉迎。”也就是说,尔朱荣最初急于找到一个宗室人物立以为帝,使自己师出有名。他在洛阳的代理人找到原本就野心勃勃的元子攸,但尔朱荣正式举兵后,并没有立即拥立元子攸,而是用铸造孝文帝的子孙及孝文帝六个弟弟的子孙的铜像,“成者当奉为主”。元子攸的铜像碰巧浇铸成功,相信这一做法的尔朱荣才不得不立他为皇帝,孝文帝的嫡系子孙无疑还是尔朱荣首先考虑的人选。

当在“一年三易换”中因“托体孝文”而“允四海之望”的元脩与执政者高欢矛盾激化,元脩西奔关中,高欢“乃集百僚四门耆老,议所推立。以为自孝昌丧乱,国统中绝,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案:指孝庄帝元子攸)以孝文为伯考,永熙(案:指元脩)迁孝明于夹室。业丧短促,职此之由。遂议立清河王世子善见。议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无父,苟使儿立,不惜余生。’乃立之。是为孝静帝。”^⑦元善见为孝文帝子清河王元怿之孙,立以为帝,自然不会出现“以孝文为伯考”的情况,但若他追赠自己的父祖,祭祀之于太庙,世宗宣武帝元恪及肃宗孝明帝元诩的神主又将被迁入夹室,“神主靡依”,从而难以保证孝文以降的“国统”。所以在立元善见为帝之前,须让其父作出“天子无父,苟使儿立,不惜余生”的明确保证,也就是说,元善见必须改宗,承认自己是伯祖世宗宣武帝一系的直属后裔,从而保证孝文帝的法统不至

于“中绝”。讥讽崔陵直称元脩“托体孝文”的魏收在其所撰《魏书·孝庄帝纪》末评论说：“至于高祖不祀，武宣享庙，三后降鉴，福祿固不永也。”表明他对孝庄帝“以孝文为伯考”亦大不以为然，当初必与崔陵等同样持“高祖不可无后”，支持立元脩为帝。元脩西奔长安三月后为西魏执政者宇文泰所杀，宇文泰虽在后来恢复拓跋鲜卑部落联盟时代的传统，尊拓跋力微为太祖，但这时仍以“孝文皇帝之孙、京兆王愉之子”元宝矩为皇帝，同样尊崇孝文帝的法统。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无疑可以确定，在北魏末一系列政治动荡过程中，帝位异动所蕴含的政治内容为确立孝文帝的法统，这也是帝位“一年三易换”的主要政治内涵。

二、孝文帝身后的政治影响

孝文帝迁都洛阳，实施“文治”，推行汉化改革，特别是重建士族门阀制度、官分清浊，造成兵士及低级武官政治与社会地位的激剧下降，从而引起他们的反抗，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北魏末动乱的一个原因，这有一定的道理。对孝文帝提出最严厉批评的，当推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他在其《习学记言序目》卷34“魏书·帝纪”条说：

诸胡乘晋乱迭据中土，极强者不过数十年，纷纠腾突，徒互为兴废而不足以定事。盖华夏地势不同，习俗亦异，统御不一，彼此不安，亦其势然也。惟拓跋迁都平城，纯用胡法控勒诸夏，故最为长久。孝文慨慕华风，力变夷俗，始迁洛邑，根本既虚，随即崩溃，亦不过数十年，天下复还中国之旧矣。然则用夏变夷者，圣人之道也；以夷制夏者，夷狄之利也。失其利则衰，反其利则灭，乌得谓“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盖书生之论也。

在同书同卷“列传”条，叶适又说：

孝文都洛最无谓。周公虽有四方朝贡道里均之说，然成周末尝受迁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尝有都洛之文？况王政废兴，岂在都邑，乃汉以后经生相承，夸大其辞耳。孝文自合更为其国开百年深厚之业，岂谓一迁洛而本根浮动，坟墓宗族，皆已弃绝，边徼镇戍，单寒无依？向非孝文，便当身见祸乱，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盖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后之学者，又将誉之不已，是以亡为存，以败为成，乌在其言王道也。

叶适认为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纯用胡法控勒诸夏”，有悖于北魏前期政治文化不断汉化的事实，而他指责的以“言王道”而盛誉孝文帝迁洛汉化的“后之学者”，确实不乏其人，隋代王通可以说是其中的先行者^⑥，亦正是上引叶适言论中被攻击的对象。王通法《春秋》而撰《元经》，述两晋南北朝史实，“稽诸史论”，“言三才之去就”，及北魏皇始而兴叹，门人不达其旨，其弟王凝（字叔恬）说：“夫子之叹，命矣。《书》云：‘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王通称赞他说：“凝，尔知命哉！”^⑦《文中子·周公篇》记王通语：“元魏之

有主,其孝文之所谓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王通在《元经》中,以晋、宋为正统,宋以下弃齐、梁、陈而“帝元魏”^⑩,当亦因为他认为孝文帝行“王道”且在位与刘宋灭亡时间大致相接,足以为华夏正统。

不过,叶适对孝文帝迁洛汉化的批评意见,与王通之类“言王道”的“书生”对孝文帝的肯定,有一个共同的立论基础,那就是所谓“夷夏之别”,均非在冷静地考察历史过程后做出的实事求是之言。现在不少研究者将孝文帝身后北魏官僚的腐败与其他社会问题,归咎于孝文帝迁洛与汉化政策,除了“夷夏之别”这一点外,与叶适持论近似。可是,从上节所述可知,北魏末年身处动乱中的人们并没有将动乱的根源归咎于孝文帝的改革,反倒将确立孝文帝的法统、肯定孝文帝的地位视为恢复秩序的法宝。北齐之初魏收所撰《魏书》中的一些论断可视为当时人对当代历史所作的总结,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对孝文帝及北魏乱亡的一般认识。《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末“史臣语”称:

有魏之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撮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溢也!

对孝文帝评价之高,可谓“无得而加诸”。同书卷8《世宗纪》称宣武帝元恪“有人君之量”,同时批说他“宽以撮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之为使西汉走向衰落的元、成、安、顺诸帝。卷9《肃宗纪》后论说:“魏自宣武以后,政纲不张。肃宗以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赏罚乖舛。于是壘起四方,祸延畿甸,卒于享国不长,抑亦沦胥之始也。”这些评论说明,当时人将魏末乱亡的根源归咎于宣武帝及孝明帝二朝未能遵循孝文帝开创的轨辙,否则北魏将长治久安。这种对当代历史的认识虽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嫌疑,却无疑是魏末尊崇孝文法统的首要原因。

史书的评论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从现有的材料看,北魏后期,只有孙绍“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一语,可视为针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否定意见,不过孙绍“天性疏脱,言乍高乍下,时人轻之,不见采纳”^⑪,在当时对孝文帝的一片颂歌声中,这一意见自然也不会被接受。就实际情形看,孝文帝已成为一种不容怀疑的象征,他所制定的政策方针成为人们批评现实政治与制度的参照物。

避开孝文帝身前的颂圣之辞不说,在孝文帝身后对其所作所为最早、最全面的肯定当推宣武帝初年“白衣”李彪请修国史的表文。文中称:“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崇祖宗之业,景功未就,奄焉崩殒,凡百黎萌,若无天地……惟先皇之开造物;经纶浩旷,加以魏典流制,藻绩垂篇,穷理于有象,尽性于众变,可谓日日出矣,无幽不烛也。”在列数孝文帝之功绩后,李彪称:“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谦尊而光,为而弗有,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诚宜功书于竹帛,声播于金石。”^⑫

宣武帝延昌年间,孙绍上表切言时弊,请制《令》,与《律》并行,如孝文帝时所为,因为随时制作的《令》比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律》更能灵活地应付现实问题。他指出:“《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也,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经纬三才之伦,包罗六卿之职,措置风化之门,作用赏罚之要,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对国家如此重要的《令》十余年来竟没有修订颁行,是因为“主议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复须升降,谁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废不理”^⑨。也就是说,在孝文帝注重儒教古训的“文治”政策影响下,宣武帝时定《令》的官员们一切都主张按古代制度行事,以至于认为孝文帝根据时势制定的《令》中的一些条文也需修改,但出于对孝文帝本人的尊崇,谁也不敢真的这样做。孝文帝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魏书》卷19上《元匡传》记元匡于宣武帝造乐器,尺度与孝文帝时所制不合,御史中尉王显弹之云:“自金行(案:指西晋)失御,群伪竞起,彝伦攸斁。大魏应期,奄有四海。高祖以睿圣统天,克复旧典……睿思玄深,参考经记,以一黍之大,用成分体,准之为尺,宣布施行……宜依先朝故尺为定。”孝明帝时,元匡又上其所制尺度,“诏付门下、尚书、三府、九列议定以闻”,太师、高阳王元雍等议:“伏惟高祖改权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参差……仰惟孝文皇帝,德迈前王,睿明下烛,不刊之式,事难变改。臣等参论,请停匡议,永遵先皇之制。”为朝廷所接受。这是孝文法度不容更改的实例。李崇在孝明帝时上书请立明堂、建学校说:“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禀圣自天,道镜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轨仪,规周汉以新品制,列教序于乡党,敦诗书于郡国,使揖让之礼,横被于崎岖,歌咏之音,声溢于仄陋……伏闻朝议,以高祖天造区夏,道侔姬文,拟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畝,即使高祖神享,阙于国阳,宗事之典,有声无实。此臣子所以匪宁,亿兆所以失望也。”^⑩

“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轨仪,规周汉以新品制”,也就是迁洛与汉化改革。正如常景在《纳颂》中所称颂的:“魏策仰天,玄符握镜,玺运会昌,龙图受命。乃眷书轨,永怀宝定,敷兹景迹,流美洪谟,袭我冠冕,正我神枢。”^⑪这正是北魏后期的人们特别是士族人物视孝文为圣主的原因,所以孝文逝世,“凡百黎萌,若无天地”;孝文不祀于明堂,便“臣子匪宁,亿兆失望”^⑫。虽然后来东魏都邺,已背离了孝文的轨辙,但窦瑗上书讨论《麟趾新制》,仍将孝文所作所为视为东魏应予继承发扬的对象:“伏惟陛下应图临宇,握纪承天,克构洪基,会昌宝历,式张琴瑟,且调宫商,去甚删泰,革弊迁浇,俾高祖之德不坠于地。”^⑬

由于将孝文帝所作的一切都视为正确的,不容怀疑,即便孝文帝制定的政策、方针事实上出了问题,人们也认为是执行中背离了孝文帝的既定路线,而不会怀疑孝文帝政策、方针的正确性。孝文帝制定的与士族门阀制度相联系的一套官制,实际上在宣武帝元恪时便已难遵行,孝明帝时崔光制“停年格”,武夫入选,专择劳旧,更引起官制的紊乱与吏治的腐败。孝明帝末辛雄请废“停年格”,整顿选举以肃清吏治,仍举张不折不扣地恢复孝文帝所制定那套制度:“高祖孝文皇帝天纵大圣,开复典谟,选三代之异礼,采二汉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继轨,每念聿修,万里清溢。”^⑭

北魏末人们对孝文帝的尊崇,实质上是对其汉化改革的拥护和肯定,也是北魏末帝位更替包括“一年三易换”实质上是以确立孝文帝的法统为政治内涵的主要原因,而确立孝文帝的法统,从本质上说,也是对孝文帝汉化成果的肯定,同时也包含着强烈的消除动乱、继续沿着孝文帝开辟的轨辙前进的理念。北镇武人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政权,无论是

如东魏北齐那样亦步亦趋地遵循北魏后期的政治制度,还是像西魏北周那样借《周礼》、《尚书》另创一套制度,都无不反映孝文帝改革对北朝后期政治的影响。

三、北魏国统与东、西魏的对峙

北魏末年,政治动乱一波接着一波,先是北镇镇兵与关陇城民暴动,接着是“北边首庶”的代表尔朱氏擅权,最后是东、西魏的创基与对峙,其间在南方梁朝影响下的势力还曾一度进入南朝军队百余年来未曾到达过的洛阳。然而在政治动荡过程中,却有一种隐隐存在的力量在支配着各种活跃的政治势力。这种力量正是我们前文论述过的确立孝文帝的“国统”,进而维护魏的法统的支持者,正视这一力量并加以利用的政治势力会获得一定的成功,如果某种政治势力忽视这一力量或者公然与之对抗,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北魏末年的黄河流域可谓“人心向魏”,一如东汉末“人心向汉”,已不再是西晋灭亡后那样,容许各种政治力量尽情地表现自己,历史已进入有序发展的阶段,有了发展的主线。

《魏书》卷74《尔朱荣传》称尔朱荣于河阴杀戮朝士后,意图篡位,“献武王(高欢)、荣外兵参军司马子如等切谏,陈不可之理”。《北齐书》卷1《神武纪上》亦说:“及(孝庄)帝暴崩,(尔朱)荣遂入洛,因将篡位,神武谏,恐不听,请铸像卜之,铸不成,乃止。”《周书》卷14《贺拔岳传》则说:“荣既杀害朝士,时齐神武为荣军都督,劝荣称帝,左右多欲同之,荣疑未绝。岳乃从容进而言曰:‘将军首举义兵,共除奸逆,功勤未立,逆有此谋,可谓速祸,未见其福。’荣亦寻自悟,乃尊立孝庄。岳又劝荣诛齐神武以谢天下。”对于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记载,司马温公撰《资治通鉴》以为前者“盖魏收与北齐史官欲为神武掩此恶”故采用《周书》的说法。

且不论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为准确,指为篡逆在当时确实是在政治上攻击敌手的有利武器。宇文泰与高欢决裂,其讨伐檄文说:“贼臣高欢,器识庸下,出自舆皂,罕闻礼义,直以一介鹰犬,效力戎行……不能竭成尽节,专挟奸回,乃劝尔朱荣行兹篡逆。及荣以专政伏诛,世隆以凶党外叛,欢苦相敦勉,令取京师。又劝吐万儿复为弑虐,暂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窃威权。并归废斥,俱见酷害。于是称兵河北,假讨尔朱,亟通表奏,云取谗贼。既行废黜,遂将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镬交及,乃求宗室,权允人心。天方与魏,必将有主,翊戴圣明,诚非欢力。”^⑧反复指斥的均是高欢表现出来的篡窃行为,其中且有“清水公贺拔岳,勋德隆重,兴亡攸寄,欢好乱乐祸,深相忌毒,乃与侯莫陈悦阴图陷害”一语,作为政治宣传,很难说前引《周书·贺拔岳传》所说便真是事实。

从史实中我们可以发现,高欢本人竭力要避免遗人以篡窃的口实。当他与孝武帝元脩矛盾激化,公元534年7月,以诛奸臣为名从晋阳起兵南下,8月,元脩在宇文泰集团的拉拢下从洛阳西奔长安,“欢自发晋阳,至是凡四十启,魏主皆不报”。至10月,高欢“又遣僧道荣奉表于武帝曰:‘陛下若远赐一制,许还京洛,臣当帅勒文武,式清宫禁。若反正无日,则七庙不可无主,万国须有所归,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帝亦不答”,在这种情况下,才推立元善见为魏帝^⑨。《北齐书·杜弼传》说:“弼尝劝高祖受魏禅,高祖击走之。”高欢虽实际控制了政权,却不敢贸然称帝代魏,这在同书卷42《阳休之传》有所说明:

(天平)四年,高祖幸汾阳之天池,于池边得一石,上有隐起,其文曰“六王三川”。高祖独于帐中问之,此文字何义。对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当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微。既于天池得此石,可谓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问三川何义,休之曰:“河、洛、伊为三川,亦云泾、渭、洛为三川。河、洛、伊,洛阳也;泾、渭、洛,今雍州也。大王若受天命,终应统有关右。”高祖曰:“世人无事常道我欲反,今闻此,更致纷纭,慎莫妄言也。”

尽管有人劝其称帝,并制作他应天受命的讖纬,高欢因“世人无事常道其欲反”,担心引起更大的政治骚乱,而不为所动。而且因为无论是尔朱氏的兴衰,还是他本人政治上的崛起,经历让他明白,高氏在政治上没有充分准备之前,“魏”仍是其协调境内各种政治势力,掌握政权的一个有力号召。

尔朱荣在孝明帝元诩死后,“海内草草,异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鸩毒致祸”之时^⑩,以诛宠臣徐纥、郑俨为名称兵向洛,灵太后冯氏对此亦作了防范措施,命郑俨宗人荥阳人郑先护与郑季明“固守河梁”,但“庄帝之居藩也,与先护深自结托……先护闻庆帝即位于河北,遂开门纳(尔朱)荣”;郑季明亦“潜通尔朱荣,谋奉庄帝”^⑪。尔朱荣推立孝庄帝,是他能以八千余人渡黄河进入洛阳的关键。朝廷公卿之所以麋河阴而被尔朱荣一举诛杀,亦因奉迎孝庄帝主动前往,而非迫于尔朱荣的兵威。即便河阴杀戮事件发生后,因尔朱荣迫于形势,没有称帝,还奉孝庄帝,追赠死难者,政局便迅速安定下来。“本有纵横志”的高乾兄弟,“见(尔朱)荣杀害朝士,谓天下遂乱,乃率河北流人反于河、济间,受葛荣官爵,屡败齐州士马”;及孝庄帝立,遣使“巡抚三齐”,高乾兄弟“相率出降”;后尔朱兆杀孝庄帝,高乾兄弟又“潜勒壮士,袭据(冀)州城……推封隆之权行州事,为庄帝举哀,三军缟素。乾升坛誓众,辞气激扬,涕泪交下,将士莫不哀愤”^⑫。当拥“魏”的汉族大族业已控制河北地区的情况下,高欢率六镇余众进入河北,不得不接受其政治主张,拥魏以维系人心。《北齐书》卷21《封隆之传》说:

寻高祖自晋阳东出,隆之遣子于绘奉迎于溢口,高祖甚嘉之。既至信都,集诸州郡督将僚吏等议曰:“逆胡尔朱兆穷凶极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共所捐弃,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时也。欲与诸君剪除凶羯,其计安在?”隆之对曰:“尔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众叛亲离,虽握重兵,其强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唱义旗,天下之人,孰不归仰,愿大王勿疑。”

在封隆之看来,高欢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并团结各种政治势力,关键是“乃心王室,首唱义旗”。《北齐书》卷18《孙腾传》说得更为直接:

及起义信都,腾以诚款,常预谋策。腾以朝廷隔绝,号令无所归,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苦请于高祖,高祖从之,遂立中兴主。

即便是通过高欢及高澄随后数十年的政治准备,逐步确立起高氏对政权的绝对控制,易代之

际,高氏内部对于遽然抛弃“魏”这一政治旗号,仍心有余悸。《北齐书》卷33《徐之才传》称:“之才少解天文,兼图讖之学,共馆客宋景业参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启之。文宣闻而大悦。时自娄太后及勋贵臣,咸云关西既是劲敌,恐其有挟天子令诸侯之辞,不可先行禅代之事。”同书卷30《高德政传》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传称其时高德政为黄门侍郎,参掌机密:

散骑常侍徐之才、馆客宋景业先为天文图讖之学,又陈山提家客杨子术有所援引,并因德政,劝显祖行禅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请。帝乃手书与杨愔,具论诸人劝进意。德政恐愔犹豫不决,自请驰驿赴京,托以余事,唯与杨愔言,愔方相应和。德政还未至,帝便发晋阳,至平都城,召诸勋将入,告以禅让之事。诸将等忽闻,皆愕然,莫敢答者。时杜弼为长史,密启显祖云:“关西是国家劲敌,若今受魏禅,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显祖入,召弼入与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与王争天下者,彼意亦欲为帝,譬如逐兔满市,一人得之,众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禅,关西自应息心。纵欲屈强,止当逐我称帝。必宜知机先觉,无容后以学人。”弼无以答……帝以众人意未协,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终,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说者以为昔周武王再驾盟津,然始革命,于是乃旋晋阳。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业等每言卜筮杂占阴阳纬候,必宜五月应天顺人,德政亦劝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禅让诏策、九锡、建台及劝进文表。至五月初,帝发晋阳。德正又录在邺诸事条进于帝,帝令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密书与杨愔,大略令撰仪注、防察魏室诸王……帝初发至亭前,所乘马忽倒,帝甚恶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复肯进。德政、徐之才苦请帝曰:“山提先去,若为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马子如、杜弼驰驿续入,观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邺。众人以事势已决,无敢异言。

这段史料表明,高洋虽乐意称帝代魏,但鲜卑“诸勋将”及杨愔、杜弼等汉族大臣都不持支持态度,甚至其母也加以反对。实际的原因,就“诸勋将”来说,高氏在十数年的执政过程中,过多依赖、放纵他们,还未能完全将其驾驭;就杨愔等汉族大臣来说,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对高洋即将新建的政权能否保护自己的利益没有信心,因为在此以前,杨愔曾支持高洋之兄、依靠汉族士人压制鲜卑勋贵的高澄禅代^⑧,杜弼也“尝承间密劝高祖(高欢)受魏禅”^⑨。但无论如何,当娄太后及鲜卑勋贵担心西魏“有挟天子令诸侯之辞”时,杜弼等也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时人重视“魏”的法统如前所述是重视孝文帝以来的法统,推而进之,是重视孝文帝以来汉化改革的成果与方向,汉族士大夫利用传统迫使鲜卑勋贵就范。

东魏之所以担心西魏“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乃因与东魏相比,当时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没有高氏迫逐天子的背景,且一直在拥护魏室的旗号下活动,以为立国之基。当高欢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势力成长,取代尔朱氏控制洛阳朝政以后,原奉尔朱荣之命进军关陇且基本上形成一方势力的贺拔岳集团的动向,引人注目。时任贺拔岳关西大行台左丞的宇文泰被派往并州与高欢接触,据说宇文泰回到关中后,向贺拔岳提出了“因地势,总英雄”而自图

发展的计策：“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举也。”^⑧收罗各种政治势力并将它们凝聚在一起，在关陇发展，“匡辅魏室”在最初是一个必须的政治主张。当贺拔岳遇刺，宇文泰初统关陇诸军之时，于谨要求宇文泰“早建良图，以副众望”，再一次提出独立发展的计策^⑨：

关右，秦汉旧都，古称天府，将士骁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饶，北有羊马之利。今若据其要害，招集英雄，养卒劝农，足观时变。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凶，若陈明公之恳诚，算时事之利害，请都关右，帝必嘉而西迁。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奉王命以讨暴乱，桓、文之业，千载一时也。

仅从谋略的角度着眼，这一计策较之诸葛亮的《隆中对》更为实际，也更为成功。据《周书·文帝纪上》宇文泰随即与魏帝元脩派往关右的使臣元毗及诸将领“刑牲盟誓，共奖王室”，被魏帝任命为大都督，获得统领贺拔岳原有部众的正式任命。后来传檄方镇，指斥高欢图谋篡位，又迎魏帝入都长安，从而获得与高欢对峙的政治资本，并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北齐书·杜弼传》称高欢列举不能对文武百官的贪残行为加以整顿的理由说：“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考诸史实，六镇余众多在高欢麾下，宇文泰所统，“军士多是关西之人”^⑩，高欢“督将家属多在关西”于史无证。而其时中原士大夫虽不少人模仿南方文人的诗文乃至剽窃，但早已不“以江东为正朔所在”。《洛阳伽蓝记》卷2记梁陈庆之拥元颢入洛后与“中原士族”会聚，座中言语交锋，较能反映中原士人的心态，兹详引如下：

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褰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无汗马之劳，高官通显。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车骑将军）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坐，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暕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热，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杆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闾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瘦之为丑。我魏膺策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踪，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

该书讥嘲“南人”的内容甚多，以上只是典型一例，这反映了在孝文帝迁洛行汉化改革以后，

中原士人即便在文化上亦不再以南方为正朔相承之邦。前引高欢之语，窃以为他真正担心的还是西魏自诩正统可能对东魏境内所造成的骚动，所以他在杜弼劝其禅代时要以杖相击，阳休之说以图讖，他诫其“慎莫妄言”。

当然，北魏的国统只在两个政权创立、稳定之时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当各方内部政治最终稳定下来，当权者业已控制全局，足以驾驭各种政治势力时，改朝换代不可避免。当高氏遽然代魏建齐后，宇文泰确实有过起兵东向的举动，但宇文氏也确如徐之才所说“意亦欲为帝”，因而宇文泰兵不出境，对高氏代魏并没有大加挞伐，以免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

东、西魏的对峙局面的出现，有其政治、军事乃至地理、人谋的因素，而各以“魏”统维系人心，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东、西两“魏”对峙以及北齐、北周均以禅代的形式建立，表明经过北魏一百多年的统治，特别是经过孝文帝迁都与汉化改革以后，十六国时代那种动荡无序的局面业已结束，黄河流域的历史已进入有序发展的阶段。

注 释：

- ① 《北齐书》卷 23《魏兰根传》。
- ② 《北齐书》卷 1《神武帝纪下》。
- ③ 《魏书》卷 11《出帝纪》。
- ④ 《魏书》卷 11《前废帝纪》。
- ⑤ 《北齐书》卷 37《魏收传》。
- ⑥ 《魏书》卷 9《肃宗纪》。
- ⑦ 《北齐书》卷 1《神武帝纪下》。案：孝庄帝即位后，追崇其父元纘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氏为“文穆皇后”，“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又追尊其兄元劼为“孝宣皇帝”。虽因孝庄帝态度强硬，“朝臣无敢言者”，临淮王元彧仍上表谏阻，称“高祖德溢寰中，道超无外”，孝庄帝所为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历观坟籍，未有其事”。详见《魏书》卷 18《临淮王彧传》。
- ⑧ 关于王通其人及其著述真伪，参考魏明、尹协理《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⑨ 《文中子·王道篇》，引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二十二子》本。
- ⑩ 《文中子·述史篇》。
- ⑪⑬ 《魏书》卷 78《孙绍传》。
- ⑫ 《魏书》卷 62《李彪传》。
- ⑭ 《魏书》卷 66《李崇传》。
- ⑮ 《洛阳伽蓝记》卷 3。
- ⑯ 《洛阳伽蓝记》卷 3。
- ⑰ 《魏书》卷 88《窦瑗传》。
- ⑱ 《魏书》卷 77《辛雄传》。
- ⑲ 《周书》卷 1《文帝纪上》。
- ⑳ 《资治通鉴》卷 156《梁纪十二》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八月及十月条。
- ㉑ 《魏书》卷 74《尔朱荣传》。
- ㉒ 《魏书》卷 56《郑羲传》二人附传。
- ㉓ 《北齐书》卷 21《高乾传》及同卷《高昂附传》。
- ㉔ 参见拙撰《高澄之死臆说》，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6 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⑫ 《北齐书》卷 24《杜弼传》。
- ⑬ 《周书》卷 1《文帝纪上》。
- ⑭ 《周书》卷 15《于谨传》。
- ⑮ 《周书》卷 1《文帝纪》称：宇文泰初统贺拔岳之众，魏帝元脩命其率军赴洛阳，宇文泰上表婉拒，表中说：“况此军士多是关中之人，皆恋乡邑，不愿东下。”